

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的颠覆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刘萍, 韩松立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沃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意义、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可译性等一些基本翻译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 驳斥了“译意”的观点; 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 悬置了“可译”与“不可译”二分。反传统的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这样的启示: 文学翻译应重视形式的传译, 摆脱意义的束缚, 跳出语言的框囿, 实现译作对原作的超越, 把握可译性意味着强调语言的差异性, 追求语言的互补性。译例的分析揭示了纯语言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实践表明: 文学翻译中释放、转换纯语言、显示语言间的亲缘性、追求语言间的互补性是可能的。译者的天职正是完成语言间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

关键词: 纯语言翻译观; 传统观点; 颠覆;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2)05-0148-05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于1923年发表的《译者的任务》被视为文学翻译研究的经典。他从语言的亲缘性出发阐述了纯语言翻译观。本雅明的翻译观被埋没多年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译者的任务》被重读,其价值为解构主义学派所发现,成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该学派代表人物保罗·德曼^[1]曾声称谁若是不了解本雅明这篇文章,他就是无知之辈。此种说法虽然夸张,但足见本雅明翻译观的重要地位。

本雅明的翻译观与其哲学观、审美观、历史观、神学观交织在一起,甚是深邃、神秘、晦涩难懂,其翻译观被引介到中国后,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乔颖^[2]从本雅明的历史观出发论述了译文和原文之间断裂性的关系;曹明伦^[3]从科学与神学的视角阐释了纯语言翻译观在象征与被象征、源语与“纯语言”之间的转换;喻锋平^[4]探讨了纯语言翻译观的哲学基础。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对纯语言翻译观的颠覆性均有提及,但很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鉴于此,笔者将从翻译中的形式与意义、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可译性三方面,通过比照,归纳阐述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译论的颠覆,旨在揭示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的启示。在此要说明的是“传统”不是指时间先后的概念,而是指方法论上的区别,虽然纯语言翻译观提出的时间相对较早(1923年),却被认为是后现代翻译的先声。

由于宗教思想的渗入,纯语言翻译观具有神秘的救赎色彩。有人认为它提倡意义虚无主义,将“纯语言”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不可译的东

收稿日期:2011-07-0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联系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9RW018)

作者简介:刘萍(1970-),武汉人,华中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与文化翻译研究。

西”^[3];有人将其视作“玄学、乌托邦理论”^[5]。也许在这种认识倾向的影响下,现有的关于纯语言翻译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在揭示其精神内核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然而,其实践层面的应用研究有待探索。刘宓庆教授曾指出:“本雅明言之有理的翻译对策是可以操之在我的。”^[6]孙致礼教授^[7]也倡导优秀的译者有义务为追求“纯语言”这一目标而付出艰辛的努力。据此,笔者将进行纯语言翻译观研究的新探索:通过翻译实例的分析,揭示其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纯语言的概念与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他将“纯语言”定义为^[8]: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有一种超历史的亲缘关系(kinship);这种亲缘关系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之中——然而,这种意指(intention)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实现的,它只有通过各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指集合(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才能实现,这个意指集合就是“纯语言”。语言的表意包括意指对象(object of intention)与意指方式(mode of intention)两个方面,不同语言的意指方式各不相同,例如法语中用 pain,而英语中用 bread,但意指对象都是“面包”。本雅明认为意指对象具有相同性,意指方式具有互补性。各种语言通过各自意义表达形式的互补交融,达到语言之间的和谐完美。

要了解本雅明的翻译观,首先得了解其充满神学色彩的语言观。本雅明认为语言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三种:物的语言、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人的语言又分为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前的命名语言和墮落后的判断性语言,伊甸园中人类的语言承载着上帝的精神,那时候的语言是大同的语言。后来有好事之徒,欲建通天塔,上帝为之一怒,将人的语言分解为各不相通的语言,即人类墮落后的语言(人类现在使用的自然语言)。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充满着对人类语言墮落现状救赎的冲动,对伊甸园中人类大同的语言与上帝语言回归的向往。翻译的使命就是使通天塔之后的语言碎片重新整合成纯语言,完成语言的救赎^[9]。

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高度对翻译的目的与本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在《译者的任务》开篇中,本雅明即以艺术欣赏作比,他将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但是其目的不是为了迎合读者。本雅明否定的不仅仅是“服务于读者”的翻译目的。德里达曾对《译者的任务》有一精炼的概述:翻译一不为读者,二不为达意,三不为再现原文^[10]。那么翻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为蛰伏在所有语言之中的“纯语言”服务的。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纯语言”、抵达“纯语言”,就是要把作品中那些内在的、固有的特殊意蕴(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性)

传递出来。让纯语言从不同语言各自意指方式的融合中呈现出来,显示出语言之间的亲缘性,实现语言的救赎。

在方法上,本雅明认为纯语言是通过直译而释放出来的,直译是形式再生产的保证,直译强调的是尽量传达原作的语言形式、风格特征。本雅明的翻译观以追求“纯语言”为终极目的,颠覆了传统翻译观中的一些基本翻译思想。

二、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的三大颠覆及启示

(一)颠覆一:翻译应注重“形式”而非“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都支持“译意”的观点。传统译论都是以文本有一定意义为前提,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重现原文的意义。纯语言翻译观否认文本的中心意义,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每经过一次翻译,原文的意义就会有一次改变,从而驳斥了传统译论中“译意”的观点。本雅明对于传统译论的颠覆是从将翻译“去交流化”开始的^[11]。在本雅明看来,作品的本质不是承载信息或者文字内容,因而翻译本质自然也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向“纯语言”接近的过程。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里提出:翻译不是译意义,而是译形式。本雅明把纯语言比喻为一个“瓷瓶”,每一种自然语言都是这个纯语言“瓷瓶”破碎时掉下来的碎片。翻译工作就像粘合碎片,恢复打破的瓷瓶,在粘合瓷瓶的过程中,译者要做的不是去找相同或相似的碎片,而是寻求能够彼此吻合的碎片。同样道理,译作不必与原作“意义相同或相似”,但译者必须细致地连通译作与原作的意指方式,使其融为一体,让原作与译作共同成为“纯语言”的瓷瓶上可识别的碎片^[8-9]。

在处理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中,传统译论强调一个“信”(loyalty)字,“信”是指在再生产过程中忠实于原文意义,“自由(freedom)”是指忠实地再生产意义的自由。“信”和“自由”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倾向^[12]。在纯语言翻译观中“信”与“自由”得到新的诠释。“信”是指忠于原作的意指方式,或者说是形式再生产的信,在意义保留和转换方面上则享有自由。传统意义上“信”与“自由”的矛盾在追求“纯语言”的这一更高目标中得到了统一^[9]。

在传统译论看来,翻译不求传递信息和内容,似乎不可思议。在此要指出的是本杰明所说的翻译是指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既然翻译的是文学就应该要译出原作的文学性。文本的文学性不仅在于它有美的内容,还在于它有美的言语形式,“构成文学言语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言语的陌生化”^[13]。在文学作品中形式与内容往往密不可分,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在这层意义上,翻译是译形式,也不无道理。但纯语言翻译观对意义完全否定,也许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翻译实践来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然而

它对某些以形式变异为特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却提供了新的阐释。

从纯语言翻译观对形式的强调以及对陌生化语言形式与作品文学性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重视,我们得到启示:保持陌生化的语言形式,译出原作的文学性。

例 1. Sinbad the Sailor and Tinbad the Tailor and Jinbad the Jailor and Whinbad the Whaler and Ninbad the Nailer and Finbad the Failer and Binbad the Bailer and Pinbad the Pailer...^[14]

译文一:水手辛伯达、裁缝廷伯达、狱卒金伯达、捕鲸者珥伯达、制钉工人宁伯达、失败者芬伯达、掏船肚水者宾伯达、桶匠频伯达、……

译文二:行海船的辛伯达和当裁缝的当伯达和看牢子的看伯达和捕鲸鱼的捕伯达和打铁钉的打伯达和不中用的不伯达和舀舱水的舀伯达和做木桶的做伯达……

源英语文本来自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的一个片段,这段文字中含有极端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一连串 and 的重复、标点的缺失、声韵结构 - inbad and the - eilo(e)r 的迭用、语言内容的缺失。作者乔伊斯在这里刻意构建一种音韵单调乏味、内容空洞、无标点的言语形式,似乎是要以一种没完没了的无聊重复把读者引入梦呓般的无意识状态,这正是原作的文学美之所在。从语义内容上看,除了第一个 sinbad the Sailor 有明显的语义出处——《天方夜谭》中辛伯达航海的故事,其他皆是对此的语音仿拟,并无真正的信息内容^[14]。

译文一中无标点被有标点所替代,一长串的 and 被译成了顿号,简单重复的语音变异被刻意的语义阐释所取代。从传统“译意”的观点来看,译文一无可厚非。若以纯语言“译形式”的观点来看,作出的评判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文中语言形式的变异在译文一中恢复成了常规,陌生变成了熟见。当原文陌生化的形式被消解时,其文学性也就随之消解。译文二模仿原文的音韵结构,保留原文语言形式的特点,恰到好处地呈现了乔伊斯这位意识流大师的诗学意图,传递了原文陌生化形式中的特殊意蕴,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

这一译例表明:本雅明所说的“内容、信息是非本质的东西”确有存在。例 1 中的这段文字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其关键在于陌生化语言形式中的特殊意蕴,在此情况下,保留原作陌生化的语言形式就是保留其文学性,这样才能传递其中的特殊意蕴。当然,文学性的体现不仅仅局限于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但纯语言的意识会使译者对陌生化语言形式中所包含的特殊意蕴更为敏感。

(二)颠覆二:译作与原作平等互补,译作是原作“后来的生命”(afterlife)

在解构主义之前,各种不同流派的翻译理论都是以“原文-译文”相对应为理论框架^[15]。传统译

论主张原作与译作之间是“模版”与“复制”的关系,认为译作是原作的仿作,强调原作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纯语言翻译观中,原作与译的关系如同“瓷瓶”的碎片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互补的。译作被认为是原作“后来的生命(afterlife)”^{[16]74}。翻译拆解了原作,杀死了原作,而译者的任务是延续原作的生命。本雅明的翻译观从生命的角度看待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文本经过翻译被赋予新的意义,并获得新的生命,译作被提升到与原作平等的地位,而且原作还是依赖译作才能生存下去。

纯语言翻译观颠覆了传统译论中原作与译作的主次关系。本雅明试图通过语言之间的关联解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译作与原作在意义或内容上无关,只是语言之间的关系,译语(target language)在与源语(source language)相遇过程中得以更新。正如李红满^[17]对纯语言翻译观所作的阐释:“译作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义,而是一种与原作的和谐,是对原作语言的补充,从而将译作从屈从于原作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从崭新的角度,把译作当作独立的文本阅读,无形地消解了传统翻译理论中译作与原作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

纯语言翻译观对译作与原作关系的界定解构了传统的忠实观。与此同时,本雅明建构了翻译超越观。本雅明反复强调翻译的语言可以而且必须从意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以利于原作意蕴(intention)的再现^{[16]79}。

纯语言为再创造式的自由翻译提供了新的、更高层次的理由,为了纯语言的缘故,译者应冲破已经腐朽了的语言障碍,卸掉意义的负担,译文也就在揭示原文的不稳定性、语言张力的不稳定性的同时,获得自身的自由,实现对原作的超越,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观带给翻译实践以下启示:摆脱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实现译作对原作的超越。

例 2.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you to undo it!”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 3^[8])

上例中,原文作者玩了一个同音词的文字游戏,在此语境中,同音词“not”与“knot”所包含的内容与信息已成为非本质的东西,而本质内容在于二词语音上的关联^[8],即同音现象才是原文中所含的特殊意蕴。

遵从“译意”的传统观念,陈复庵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将原文中的划线部分译为:“我想你是讲到第五个拐弯的地方吧”,“我还没讲到”,“打了一个结啊,让我帮你把它解开”。^[8]“I had not”与

“A knot”被直译为“我还没讲到”、“打了一个结”。译文传递的是“not”与“knot”二词的内容信息,此种翻译可能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对非本质内容的非准确转述”^{[16]78}。陈译将“knot”译为“打了一个结”,中断了对话信息交流的关联。此前两句一问一答交流顺畅“你讲到了……吗”,“我还没讲到”,对话接下来的一句突然冒出“打了一个结”,显得突兀。不仅如此,原文中“not”与“knot”二词同音的特殊意蕴在翻译中亦未能传递出来。依据服务于“纯语言”的翻译目的和宗旨来判断,此译文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赵元任先生对原文划线部分提供了另一版本的译文:“你说到了第五个弯弯儿嘞,不是吗?”“我还没有到。”“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罢!”^[8]赵译抓住原文中“同音”的本质特点,将“not”与“knot”译为“到”与“刀”,不仅很好地取得了上下文的关联,而且通过汉语“到”与“刀”的谐音,传递原文中语音游戏的特殊意蕴。赵译的成功在于摆脱原文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开发并转化了原作中语音游戏,体现了译作与原作平等互补的翻译超越观。

这一译例告诉我们:(1)虽然纯语言翻译观推崇直译,但要避免机械直译,若直译不能传递纯语言时,就应该诉诸于一定的补偿或变通手段,实现翻译上的超越;(2)翻译中显示语言的亲缘性是可能的。以例2为例,虽然英汉两种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语音系统,但二者均有同音或谐音的语音现象,这就是语言的亲缘性。译者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把潜藏在原作中的特殊意蕴尽显出来,实现开发、转换纯语言的目的,体现语言的亲缘性^[8]。

(三) 颠覆三:可译性由原作性质决定,它是语言自身发展的渴望与诉求

传统翻译观中的“可译性”是指两种语言之间在形式上或内容上的对应,传统译论基于“求同”的观念,忽视了两种不同事物间的相反相成。本雅明认为可译性是寄寓于语言内部的客观法则,是作品所固有的本体特征和“再生”能力,是语言自身发展的渴望与诉求,它独立于人的主观经验之外^[9]。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原作的“可译性”,它以隐性的状态等待着解蔽,等待着在“差异”中“延异”自身。从不可译到可译是个连续的变量,本雅明对可译性大小的理解也与传统译论大相径庭。本雅明认为原作的语言品质愈是独特,它对于语言改造的意义就愈大,而可译性就愈大。本雅明翻译观中“可译性”的前提不是追求译作同原作的相似,而是把译作视为原作的“后来的生命”,因而本雅明的翻译观早已超出从而悬置了传统译论中“可译”与“不可译”的二分。

在操作上,把握可译性就意味着要尽量反映语言间的差异。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强调程度与反映程度。纯语言翻译观认为:翻译的目

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翻译时,应尽量包容异质语言的意指方式,追求语言间的互补性。本雅明指出翻译就是要颠覆语言内部意义和内容对表达方式的控制和固化,摧毁意指方式和意指内容之间稳固的关系,通过引入陌生语言中新异的意指方式,促进语言自身的发展^[18]。纯语言翻译观对可译性的阐释带给我们启示:把握可译性,反映语言的差异,追求语言的互补。

例3. Wine was thicker than blood to the Mondavi brothers, who feuded bitterly over control of the family business, Charles Krug Winery.^[19]

上例中划线部分“Wine was thicker than blood”显然是对英语谚语“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的仿用,该谚语意在强调亲情的重要。“Wine was thicker than blood”复制了该谚语的表达形式,表达的意义却正好相反,意指兄弟俩把酒厂利益看得比手足亲情还重。仿用产生的是一种幽默讽刺的特殊效果。对于划线部分,孙致礼教授^[19]提供了两个译本:(1)(蒙特维兄弟)忘了手足情谊;(2)(对于蒙特维兄弟来说),酒浓于血。前者用译语中人们熟悉的表达方式“忘了手足情谊”替代了原文中的意指方式,导致原文中仿用的痕迹消失殆尽,蕴含其中的讥讽之意也随之消解。后者通过直译,保留了原文“酒浓于血”的意指方式,让人联想到“血浓于水”的表达,传递出原文仿用之精妙,尽显原文中幽默、讽刺的意蕴。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异质语言表达之清新,体现了语言的互补性。

这一译例表明:通过异质语言意指方式的引入,可实现对语言间互补性的追求。

三、结语

笔者文概括了“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翻译思想的三大颠覆:(1)驳斥了传统“译意”的观念,强调对形式的重视,纯语言翻译观对传统译论中的“信”与“自由”作了新的诠释,将“信”与“自由”统一于“纯语言”这一更高目标下;(2)颠覆了传统译论中原作与译作的主次关系,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认为译作是原作的“后来生命”,它们同为“瓷瓶的碎片”。指出译作与原作是一种平等互补的关系,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同时建构了翻译超越观;(3)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对“可译性”的理解,认为“可译性”是原作性质决定的,是语言自身的渴望与诉求,从而悬置了“可译”与“不可译”二分。在此要指出的是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神秘意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看待纯语言翻译观中对内容与意义的完全否定、对译文与原文相似性的否定等某些极端观点时,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纯语言翻译观因其独特的观点,对文学翻译不无启示,我们不妨批判性地借鉴,以便对翻译实践作出新的阐释。

反传统的纯语言翻译观带给文学翻译如下启

示:文学翻译应重视形式的传译,保持陌生化的语言形式,译出原作的文学性;译作应摆脱原作意义的束缚,跳出语言的框囿,实现翻译上的超越;把握原作的可译性意味着应尽量体现语言差异性,译者应引入异质语言的意指方式,追求语言的互补性。在方法上,直译法得到推崇,但要避免机械直译,当直译未能达到传递纯语言的翻译目的时,应采取变通与补偿的手段。补偿与变通的手段灵活多样:可增、可减、可注释、可替代,但万变不离其宗,即:旨在转换、呈现纯语言。实践表明:翻译中释放、转换纯语言,显示语言间的亲缘性、追求互补性是可能的^[8]。无论是源语还是译语都会腐朽、固化,正是翻译促进语言间的互补,使语言有了生命和活力,得以提升、发展,译者的天职正是努力把握可译性,利用语言间的差异,完成语言间共生互补的伟大工作。

参考文献:

- [1] 保罗·德曼. “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M]//郭军,曹雷雨.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84.
- [2] 乔颖. “以后生存”还是“继续生存”——本雅明译论中译文与原文及其相关关系中的断裂性初探[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6):121-125.
- [3] 曹明伦. 揭开“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6):79-86.
- [4] 喻锋平. 论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哲学基础[J]. 江西社会科学,2010(3):218-222.
- [5] 郑海凌,许京. 沃尔特·本亚明的玄理[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45-60.
- [6]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2005:450.

- [7] 孙致礼. 在目标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读《求婚》译文有感[J]. 中国翻译,2009(2):90-92.
- [8] 刘萍. 纯语言翻译观的现实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10(1):54-60.
- [9] 黄海容. 本雅明翻译观评述[J]. 中国翻译,2007(4):19-24.
- [10] 袁伟. 本雅明说的是啥[J]. 国外文学,2007(4):47-58.
- [11] 袁筱一. 从翻译的时代到直译的时代——基于贝尔曼视域之上的本雅明[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1):89-95.
- [12] 陈永国.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
- [13] 王东风. 变异还是差异——文学翻译中文本转换失误分析[J]. 外国语,2004(1):62-68.
- [14] 王东风. 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J]. 中国翻译,2001(5):43-47.
- [15]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87.
- [16]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ranslator[M]//SCHULTE R, BIGUENET J.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
- [17] 李红满.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发轫——读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36-38.
- [18] BENJAMIN W.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913-1926) [M]//MARCUS B, JENNINGS M W.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262.
- [19] 孙致礼. 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 中国翻译,2003(1):48-51.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Views by Pure Languag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Its Revelation

LIU Ping, HAN Song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P. R. China)

Abstract: Pure language translation theory subverts traditional views on some basic translation issues, such as form and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ranslated text, translatability etc.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views by pure language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ree aspects: it retorts the emphasis on translating meaning, it eliminates the antithesis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ranslated text, and it suspends the dichotomy betwee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xamples was conducted. The study revealed it was possible to show the kinship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languages so as to release and convert pure languag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pure language translation theory; traditional views; subvers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